

●管继平

■文人尺牍（三十八）

著书老去为情

——沈从文致李恺玲

我发现民国文人不仅是做文章的大师，其实也是写情书的高手。像鲁迅、胡适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梁实秋等等，情书写起来都是洋洋洒洒、妙语纷呈的，而且他们都有专门的“情书集”出版，最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公开的胡适与韦莲司的一百七十余封书信，虽大陆没有专集出版，但多年前我从台湾带回一册台北联经版的《不思量自难忘：胡适给韦莲司的信》，归为情书集，应该毫无问题。谓予不信，可自参阅。当然，除了上述几位外，说起情书，人们肯定不会忘了还有一位沈从文。如果说徐志摩是甜言蜜语，“浓得化不开”的“情书高手”，那么沈从文就应该是甜而不腻、锦心绣口的“情书圣手”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前几位文人都是留过洋、接受过新思想的大师，而唯有自称“乡下人”的沈从文，莫留学洋，他甚至连正规像样的学校都没上过，文字却如此的清丽脱俗，可见“高手在民间”，从来即是。

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故事，已经成为爱情的经典，屡被传诵。一些沈氏的经典名句，譬如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再有，“在青山绿水之间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走过这座桥，桥上的是绿叶红花，桥下是流水人家，桥的那头是青丝，桥的这头是白发”……经常在朋友圈中被反复吟唱，经典也熬成了“鸡汤”。不过，沈从文的句子确实不是一般的美，在推行白语文并无多少年的当时，他几乎丝毫不受文言的束缚，创造出一种纯新的语境，叫人耳目一新。我比较欣赏的一句是：“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，永远不会老去，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。”所以，当沈从文的情书，他的诗句，像雨点一样，砸向一位青年女生时，那种语句的神奇魅力，以及造成美好的遐想，很难想象谁能抵挡这样的文字？——何况那时的张兆和才十八岁。不过，张兆和还是一位很有定力的女孩，首先是置之不理，再状告校长，然后仍是不加理会……没想到沈老师的耐力超过她的定力，历经四年，在几百封情书的“火力”攻势下她终于动了心，才发出了一份接纳求爱的电文：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！”

……虽然我没有那么大福分，收藏到沈从文的一纸情书，但我还是很幸运，几年前从朋友处分得了一通沈从文晚年的墨笔书札。此信文字较长，有一千四百余字，差不多是我所藏的文人书札中最长的一封信了。信共三页，写在自裁的三张一方尺左右的宣纸上，恰好就是过去所谓的“尺牍”了。

在民国文人中，沈从文应该是善于写字的一位，且长于章草。他年轻时在老家湖南凤凰念过几年私塾，能写一手恭楷。后当兵时，被一位稍有学问又爱好收藏古玩의统领官看中，留在身边当他的书记员。平日除了抄写公文外，还帮他整理一些书画古董，并编目登记。所以年轻的沈从文有幸接触了“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，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，还有十来箱书籍，一大批碑帖……”那时他稍有空闲，就会将那些旧画古器一取出，鉴赏把玩，遇上不懂之处，就去翻阅《西清古鉴》《四库提要》等一类工具书，如此日积月累，学问大长。这与他后来的研究不无关系，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，沈从文被“边缘”化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抄抄写写“打打杂”，但他反而耐得寂寞，改行研究起各种文物来，从一名现代小说家成功转型成历史博物专家。

著名作家汪曾祺，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，他回忆沈先生平时的娱乐除了看电影就是写字，他说沈先生“写草草，笔稍偏侧，起笔不用隶法，收笔稍尖，自成一格。”也不仅是草草，沈从文说他以前在军队里，常用薪金多余的钱来买书法碑帖，譬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褚遂良《圣教序》、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等，不过他擅长的是小字，大字偏弱，以前发愤用功的也是小楷。所以我在解读此信时，他的许多草字都按规定的草法，尚不难释读，可是他写字似不太讲究纸笔，用的笔也就是一毛几分的学生习字笔，磨的墨也很随意，干了点水就接着写，所以浓淡不均。由于此信每字仅半厘米大小，又是以毫无锋颖的秃笔来写，故许多字笔划交并处最难识读，好在个别字与朋友一起连蒙带猜，即使有一点点小误差，但通读已无大碍了。

沈从文此信是写给武汉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师李恺玲的，我上网查“李恺玲”，所得的人物资料甚少，仅有他与人合编并于八九十年代出版的《康濯研究资料》和《聂华苓研究专集》两书，看来应是一位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老师。他也写过几篇关于沈从文小说研究的论文，如：《冲淡又深情——从小说<萧萧>谈沈从文的艺术风格》，刊于《武汉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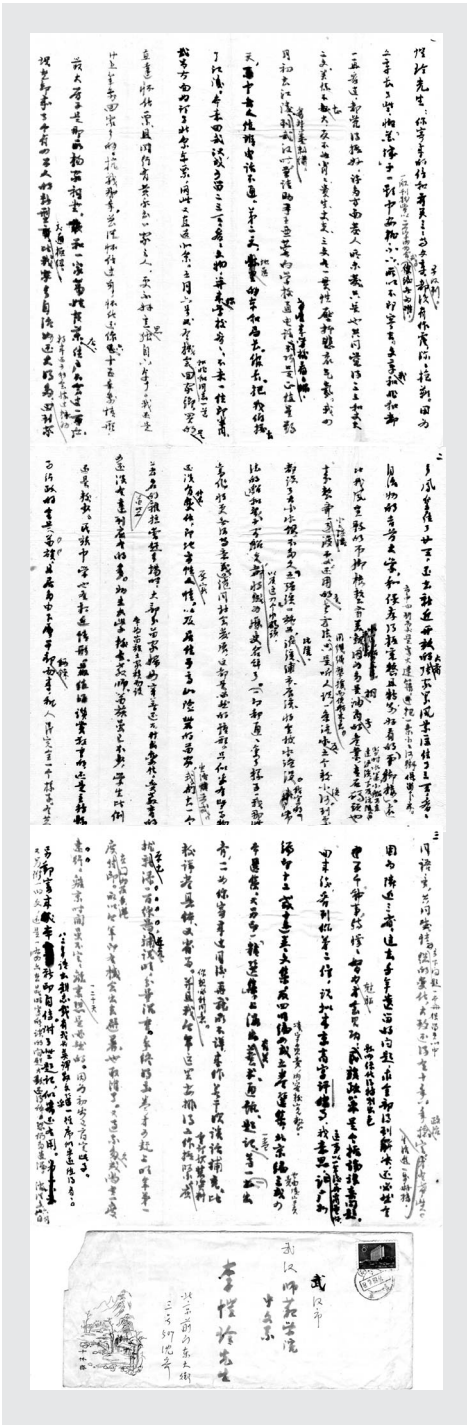
会科学版)》1982年06期；《不露声色的鞭笞——从小说<新与旧>窥沈从文的艺术风格》，刊于《江汉论坛》1982年第7期。那么这两篇论文的刊发日期，正好与沈从文的几次通信时间相近，我估计沈从文应该就是在收到了李恺玲写好的论文后，但还未发表出来的时间背景下，与李恺玲写了这封信。且看信的内容——

恺玲先生：

你寄来的信和有关“三三”等文章，早收到，都没有作覆你，抱歉。因为文章长了些，怕《花城》于一期中安排不下，便编者为难（一般刊物常以一万字内为合式。），所以不即寄去。文章我和兆和都一再看过，都觉得极好，许多方面发人所发。只是也共同觉得“三三”和“丈夫”二文，关系部甚大，反不如“肖肖”“贵生”“丈夫”三文一贯性压抑悲凉气氛。我四月初去江陵（看楚墓制绣），到武汉时，曾请助手王亚蓉向学校通电话，希望来学校看看你，不巧是正值星期天，系中无人值班电话不通。第二天，地区的东和局长、馆长，把我们接去了江陵。本意回武汉，或可留二三天看看文物，并来你学校看看，不意一住即半月，武昌方面为订了北京车票，因此又直返北京。五月六号，又有机会和兆和同志一道回家乡，买的是直达怀化票，且同行有黄永玉一家三人，更不好意思独自下车了。我还是廿五年前回家乡的。抗战那年，曾从怀化过身，怀化还像六十五年前情形，最大房子是那所杨家祠堂，和一家葛姓药店，住户不会过一百户，现在却成了个有四万人的新型交通枢纽，比我家乡自治州还大得多，将来还可能株洲。回到家乡凤凰，住了廿天，还去新近开放的大庸张家界风景区住了三天，看看自治州的吉首大学，和保存得极完整且特别好看的“吊脚楼”，(市中也到处是高大建筑，还把一条小小河街保留下来。)远比我凤凰县的吊脚楼整齐美观，因为都是桐油商号的产业，青石码头也。（当时水运，小船可直达泸溪，下及沅陵。）十分整齐，小小溪渚过渡处还用的是老方法，用绳绳攀援而使船来去。只是听人说，一条沅水及五个较小的溪河，到处都没了大小水坝，不多久“五强溪”一施工，沅陵、泸溪、浦市、辰溪，将会被水淹没。我写的《常德的船》和几十万的产业，青石码头也，都将成为历史名辞了。（一切都通变了样子，我那些旧作将更无何等意义。）随同社会发展，这都是必然的情形。只似乎有些事物还没有什么变化，即地方性厚实人情，以及居住于高山险隘的苗家生活方式。我们去一个著名的苗营雅拉营赶乡场时，大部分苗家妇女穿着不怎么变化，受教育的是较少。民族中学也有相近情形，最值得赞赏敬重的，还是主持县事行政的全是苗族，且居多由下层干部锻炼而成，和人民完全一个样子，有共同语言，共同感情，乡下问题一本册保留在心中。总的变化，大致还得有十年八年政治稳定，生活进一步好转，才有希望。因为邻近三县，过去千年遗留的问题，求全部得到解决，还必然有万千种事，待慢慢努力克服才会见功！（县内绿化得特别出色）民族政策是个极端复杂问题，回来后看到你第二信，说拟来京商写评传事，我意思这事以一年后再商量好，让广州编印十二（或十）卷文集，及四川编四或五卷选集（凌字负责，内容较完整），北京编三或四本选集（也由凌字负

前一封信中，李恺玲论文尚未写成，请教了几个问题，沈从文附另纸一一注明。在信中沈对自己几十年的沉寂以及社会的变迁颇发感慨，他还有一种矛盾的心理，既表示自己的旧作已为陈述，失去存在意义，重新付印，不过是“至多在当前能起些点缀作用”，但又叹息年轻人，包括自己的晚辈至亲，对他都已不了解了。新时代里，沈从文在“博物馆极端寂寞沉默中，过了卅年，倒觉得在人为风风雨雨中，把新学的种种常识为人民服务，既少是非，日子也过得比较安静。”他说“凡事都可从打杂帮忙中用其所长”，自己在博物馆中，只争取做一个“合格说明员”即可，如果这个资格也达不到，就再降低目标，“只求达到一个合格的公民资格，就心满意足！”信中的这些话，虽是自嘲，其实也不乏讽世之意。

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有那么一段被冷落的日子，不过他却没在“冷落”中荒废自己，利用自己以前对文物知识的积累，研究起古代的瓷器、漆器、丝绸、刺绣、服饰等，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的学术大著，他逝世后，后人又将他的一些博物小文编成一本《花花朵朵，坛坛罐罐》。所以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，汪曾祺为老师写的诗句有：“犹及乡听楚声，此身虽在总堪惊。玩物从来非丧志，著书老去为抒情。”在弟子汪曾祺的眼里，沈先生是具有诗人气质的，即使搞文物研究，也是非常的天真、投入，因此他称老师从事的是“抒情考古学”。不过，在三十年的沉寂中，沈从文恐怕再也写不出那种如新摘玛瑙璫桃般的诗句了，把美丽的女子写进了诗里，而诗人自己终究会老去。



前一封信中，李恺玲论文尚未写成，请教了几个问题，沈从文附另纸一一注明。在信中沈对自己几十年的沉寂以及社会的变迁颇发感慨，他还有一种矛盾的理心，既表示自己的旧作已为陈述，失去存在意义，重新付印，不过是“至多在当前能起些点缀作用”，但又叹息年轻人，包括自己的晚辈至亲，对他都已不了解了。新时代里，沈从文在“博物馆极端寂寞沉默中，过了卅年，倒觉得在人为风风雨雨中，把新学的种种常识为人民服务，既少是非，日子也过得比较安静。”他说“凡事都可从打杂帮忙中用其所长”，自己在博物馆中，只争取做一个“合格说明员”即可，如果这个资格也达不到，就再降低目标，“只求达到一个合格的公民资格，就心满意足！”信中的这些话，虽是自嘲，其实也不乏讽世之意。

责），又另印一“精选集”，上海出有关艺术、通讯、题记（一卷）等一一出齐，一一为你寄来过日后，再就所不详，来作若干次谈话补充，比较详尽具体，又省事。你想必能同意。并且我这里安排的工作极紧，重订服装资料，应就原书再添一百彩图，并补充说明，分量沉重，年终时交卷，才可赶上明年第一度在国内及香港付印。所以今年即有机会出去避暑，也取消了。又过不多久或尚有一度运行，离京时间虽不定，离京一二十天恐是必然的。因为初步已商定此事。

另邮寄来本新印自传，附了些题记，似乎还有用。（八二年读书杂志载有我为英译散文作一短序似乎还值得看看。）

又另附一旧文，还是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写的，谈的问题大致还得体，恐仍多遗漏。

沈从文 六月八日

此信沈从文末落年款，幸好还带有信封，从模糊的邮戳上依稀看出是“1982年”，时间正好吻合。就我所见，此阶段沈从文前后共有两封信写给李恺玲，我所藏的“六月八日”是后一封，前一封是前一年的“十二月十八日”，所谈的均是回答李恺玲关于写沈从文小说评论的事。八十年代初，文艺复兴已经开始，一批曾被“新时代”冷落的作家，在岑寂了三十年后，又掀起了热潮。沈从文即是其一，他三四十年代所写的一些小说，又被发掘出来，重新出版后，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并研究。这封沈从文的回信，就是读了李恺玲的研究论文后所写，信中提了一点意见，并表示文章太长，不便推荐到《花城》刊发。至于信中写的“三三”“丈夫”“贵生”“肖肖”应为“潇潇”等，都是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篇名。另提到的一位“凌字”，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，也是一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，后写过《沈从文传》。而在

前一封信中，李恺玲论文尚未写成，请教了几个问题，沈从文附另纸一一注明。在信中沈对自己几十年的沉寂以及社会的变迁颇发感慨，他还有一种矛盾的理心，既表示自己的旧作已为陈述，失去存在意义，重新付印，不过是“至多在当前能起些点缀作用”，但又叹息年轻人，包括自己的晚辈至亲，对他都已不了解了。新时代里，沈从文在“博物馆极端寂寞沉默中，过了卅年，倒觉得在人为风风雨雨中，把新学的种种常识为人民服务，既少是非，日子也过得比较安静。”他说“凡事都可从打杂帮忙中用其所长”，自己在博物馆中，只争取做一个“合格说明员”即可，如果这个资格也达不到，就再降低目标，“只求达到一个合格的公民资格，就心满意足！”信中的这些话，虽是自嘲，其实也不乏讽世之意。

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有那么一段被冷落的日子，不过他却没在“冷落”中荒废自己，利用自己以前对文物知识的积累，研究起古代的瓷器、漆器、丝绸、刺绣、服饰等，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的学术大著，他逝世后，后人又将他的一些博物小文编成一本《花花朵朵，坛坛罐罐》。所以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，汪曾祺为老师写的诗句有：“犹及乡听楚声，此身虽在总堪惊。玩物从来非丧志，著书老去为抒情。”在弟子汪曾祺的眼里，沈先生是具有诗人气质的，即使搞文物研究，也是非常的天真、投入，因此他称老师从事的是“抒情考古学”。不过，在三十年的沉寂中，沈从文恐怕再也写不出那种如新摘玛瑙璫桃般的诗句了，把美丽的女子写进了诗里，而诗人自己终究会老去。

近年，上海书坛活跃着一支“记者团”，是由上海书协二十余位会员自发组成的。上月，笔者参加了上海书协举办的记者团研修班，又深入了解了“书法记者团”及其工作。笔者虽从事宣传工作多年，接触了不少媒体记者，但没有像他们这样让人感到，为了一个话题可以讨论到深夜，为了一个数据几进图书馆，为了一个课题可以加班至凌晨三点。八小时之内他们在自己单位上班，八小时之外承担着这份“记者”工作，采访、调研、“爬格子”，有时还搭上了节假日和公休时间。

在研修班上，笔者与一位八零后“记者”闲聊，问及为何喜欢这桩“差事”，他说是“情怀”。“情怀”这两字可能对有些人来说，觉得这是在“忽悠”，但笔者感到他是认真的，发自内心的，而且是一种自觉的“情怀”。这“记者团”一不拿工资，二不拿津贴，靠的就是情怀和热爱。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曾说：干记者这行，行万里路，阅无数人，最后沉淀下来的是内心最看重的。这所谓看重的应该就是这位八零后所说的“情怀”？对书法的情怀，对会员的情怀，对读者的情怀，对这座城市的情怀。

上海为何会出现“书法记者团”？笔者以为，每一个文化现象或公益行为的出现并非孤立的，而是潜溶于它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。从上海的文化发展态势看，打响“上海文化”品牌已成为当下文化艺术界所追求的目标，仅上海书坛从书法参与《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工程》到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；从六届“兰亭奖”上海作者名列全国获奖数榜首到上海书协“官微”关注数为同道前茅等，这都是艺术水准与品牌力的作用，同时，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上海的书法生态环境。与此，海派书法的渊源、传承及文化底蕴也无意间催生了这样一群隐形“记者”，或者说业余“记者”，也促使一群喜爱书法宣传、评论、策划的书法人得以顺利“冒出”地平线。面对上海的书法发展、书法实践、书法教育以及书法现象他们总是在观察，在思考，或许这就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造就了这支“书法记者团”。

从“记者团”的人员构成看，可以说是多元的。他们中有资深的“真”记者、大学老师，从新闻宣传文化的骨干和网络写手等。从年龄看，他们大多为八零后、九零后，应该说“正当时”，这个年龄段的成长路线也决定了他们今天的思维空间，适于这个爱好。加之生逢这座城市，这个时代，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整合是快捷的，而且，客观上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去调整和整合，两个年龄段那种正视与理智的同行也促使着他们不断融合与完善。上海书协潘善助秘书长说：他们既是业余的，又是专业的，他们思考问题的切入点是专业的。走进新时代，书协工作必须因时而变，“记者团”在探索协会工作模式转变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看来，书协对这支“记者团”是充满期望的，在为他们鼓劲打气，加压明责。当然，上海书协近年来也在探索新会员的管理机制，也出台了不少创新措施，比如，对新会员举行庄严的人会仪式，人会宣誓、填写承诺书等，这些都给年轻的书法作者在思想上做了铺垫，让新会员从“进门”起就要树立一种荣誉感和对协会的认同感、归属感，协会为会员服务，会员为协会分忧，为协会出谋划策。

“书法记者团”这个名字很响亮，可谓是一个励志、大气的团队名字。不过，也有“记者”告诉笔者：当“记者”不容易，当好“记者”就更不容易了。还说：记者不能只唱赞歌，还要多提意见，不要捂着伤口去唱赞歌。此言虽有其理，笔者还是以为该唱的赞歌还是要唱的，关键是要唱准确，别跑调；意见要提，关键要提有用的意见，建设性的意见，切勿道听途说，发个牢骚起个哄。

的确，上海“书法记者团”的成立，为上海书协延长了工作手臂，扩展了工作渠道，提升了对外的影响力。当下，在互联网时代，人人都是记者，人人都可以做记者的语境下，理性和责任是“记者”最为重要的。据悉，上海书协还将对这支“记者团”进一步的整合，激发“记者”活力，把这支业余的“记者团”打造成集报道、采访、评论、调查、研究与策划于一体的综合性团队，成为上海书协的“智囊团”。这里，笔者又要借那句外交辞令作为拙文的尾声了：让我们拭目以待！

●杨祖柏

上海有个『书法记者团』

简斋闲语

●刘永高

《挥书别笺》

（一）

书之有道费玄论，激赏由来悦雅言。
慕极乌衣风气爽，关乎白石品行尊。
危峰造化孤松影，俊笔悠游满纸痕。
可妒性灵盈翰逸，应能冥契古人魂。

（二）

炫技趁时智若昏，藉狂自诩站心源。
文辞错谬断中夏，笔墨谦和助后昆。
古道风规熏晋韵，浮名格物叩禅门。
字语奥义谁能及？读史发凡凭几番。

《某名人论某君狂草诗》

极口揄扬为那因？新时说项也逢人。
狂论恣肆蛟龙魄，孰掩阿谀旭素贻。
万象拈成芜杂笔，一吟陷入渺茫尘。
砚田异景原真本，过往无须附驥身。

《归去来兮赵孟頫》

信是湖山润笔芒，前朝身世旺无妨。
鸣波影可窥千岁，气宇谁能悦五皇？
自得风规求美善，还从古意化刚柔。
晚来北海烟云合，便是中和夺晋唐。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家揄谭（二十二）——钱瘦铁

在海派书画家中，以“铁”名世者不乏其人，如吴昌硕称“荅铁”、王冠山称“冰铁”，钱瘦崖称“瘦铁”，此三人被誉为“江南三铁”。

钱瘦铁（1897—1967）名崖，一字叔崖，号瘦铁，以号行，别号数青峰馆主、天池龙泓斋主等，江苏省无锡市鸿声里人。斋名有瘦铁斋、梅花书屋、峰青馆、磅礴、契石堂、一席吾庐、煮墨盒、临江观日、天池龙泓砚斋等。钱瘦铁为“中国画会”创始人之一，擅长中国画，山水画师法石涛，也擅长书法，但尤以篆刻成就最为世人称道。钱瘦铁早年家境清寒，十二岁自家乡往苏州护龙街唐伯谦所设汉寅阁为学徒。唐伯谦是当时苏州刻牌名手，精碑帖鉴别，亦擅檉碑帖，郑文焯、吴昌硕常以碑帖委之装池，瘦铁因识郑、吴二公。满师后仍居苏州，设刻字摊以鬻艺。王余奋励为学，诗文受教于郑文焯，治印为伍弟弟子，后又识画家俞语霜，授以六法。瘦铁自谓艺事受此三人影响最大。郑文焯为署斋名“瘦铁宦”，因号瘦铁。

1916年移居上海后，钱瘦铁先后参加海上题襟馆等金石书画会组织，获交陆廉夫、王二号、黄宾虹、吴待秋诸老辈，颇得启掖之益。由是倾心园艺，渐次亦声名鹊起，曾主持红叶书画社及中国画会。1922年，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游沪，得观瘦铁所作，盛赞用笔简远，许为“支那巨手”，一经

揄扬，居沪日侨纷求其画。1923年3月，首应日本艺术界邀请赴日举行画展。濒行，其师俞语霜托将所作佳品携东以待赏资，亦颇受欢迎，及归沪报命，而语霜已逝，瘦铁悲勋莫名，遂将所得为印选集以永其传。1935年再度赴日，时其书画篆刻愈臻佳妙，亦常在1937年日本创刊的《书苑》杂志发表文章，深为东瀛同道所推重。在日本期间，钱瘦铁与郭沫若、金祖同两先生往还至密。

卢沟桥事变，日寇疯狂侵略中国，对旅日爱国华侨，亦时加迫害。钱瘦铁与郭沫若、金祖同两先生对日本当局之种种行径，深感不满，商议先后归国，共赴国难。郭沫若首先行动，瘦铁为之筹措款项，离日清晨，亲雇一车至其家，并将己之西装革履与之，使沫若先生能易其睡衣，顺利不辞妻子而悄然化名返国。事后，为日警侦知，加之瘦铁平素对日本侵华政策时时谴责，警方遂加逮捕，欲强令下跪，瘦铁怒不可遏曰：“此不唯污辱我，实即污辱整个中国人。”因随手执金属烟灰盅以击日警。其他日警睹状，乃蜂拥猛殴瘦铁，至晕倒地。卒以扰乱治安及杀人未遂之罪，判处徒刑四年。入狱后，幸得一通晓医术之朝鲜籍政治犯为之治疗，并时时助之。画家桥本关雪在外亦为之奔走。其案在报章揭露后，有正义感之日本人士对瘦铁多表同情，由是艺名益著，四方求其

书画篆刻者，倍于从前，狱中笔润收入，竟出意外。刑满出狱，由日警押送上船遣归，并谓不准再踏上日本国土，时约1941年6月。对于钱瘦铁的这种精神，人多有称赞，其友人曾赠诗云：“当年投狱甘无悔，自有干生国土知。”回国后，钱瘦铁不废笔墨，卜居于辣斐德路（今复兴中路），在日伪统治下，生活极清苦，常以山芋充食，故名其室为“芋香宦”。抗战胜利后，迁居外白渡桥畔之黄浦路，画室面对黄浦江与吴淞江会合处，因言其室曰“翦淞楼”，亦名“临江观日楼”。

钱瘦铁最擅篆刻，早年的篆刻，巨印重气势，以质朴雄厚见长，小印悠雅典丽，趣味含蓄。朱文取资广泛，白文则或铸或凿，刀法苍利，各印章法虚实变化一任自然。钱瘦铁作篆喜欢拍天割地，下刀淋漓，豪迈劲健。其刀法既得力于他的书法用笔，又有鲜明的独造。钱瘦铁继承前贤，去吴熙载的劲健酣畅，钱松的凝滞含蓄和吴昌硕的雄厚茂密，以刀代笔，绝少修饰，一任巨刻刀恣恢，在刀与石之间尽情驰骋，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刀法的表现力，这是前无古人的贡献。韩天衡对其印风以“豪道浑”三字概括，极其精当。钱瘦铁印的章法力求打破平板划一的格局，或疏朗，或致密，用朱文则大胆留白，白文大胆留红的构思，加之墨渗淋漓般的并比残破手法，造成简洁朦胧的效

果，是全印呈现朱白对照强烈的奇趣。

钱瘦铁的书法上追汉魏，不拘于点画而重意味情趣，字里行间，朴茂简漫，古意盎然。钱瘦铁篆书宗石鼓文及秦诏版，拙朴醇厚、沉逸潇洒，独具面目。篆书取法《张迁碑》《石门颂》和汉简，萧疏奇古，不受绳墨。楷书法乳钟繇及《曹娥碑》，裨益清秀。草书学孙过庭，凝练洒脱。总体讲，钱瘦铁的书法以隶书成就为最高，行草书次之。

钱瘦铁亦擅长绘画，笔墨酣畅恣肆，气格壮伟，力度过人，即使是尺素小品，也有寻丈之势。山水源于黄山画派，与实体、石溪用力甚多；继法董源，的山水写生之便，笔墨苍莽凝练，气势雄浑，意境深远，花卉似沈周、徐渭、金农，设色沉着古艳，着墨苍秀。虽然钱瘦铁书法、绘画、篆刻见兼擅，但主要还是以印名世。

1947年，钱瘦铁以中国外交使团文化秘书的身份又赴东京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钱瘦铁转辗香港、广州等地返沪。是年，上海新中国画研究会成立，为该会会员。1956年上海筹建分会画院，受聘为画师，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，以迄逝世。1957年秋，在画院被错划为右派，至1961年摘帽。晚年患有肺气肿，至“文革”受辱，被诬特务挨斗，病情益剧，进发心脏病而卒，享年70岁。